

中共党史专题讲义

(二)

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
中共党史教研室 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中共党史专题讲义

(二)

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
中共党史教研室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中共党史专题讲义

(二)

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

中共党史教研室编

•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本社内部发行

•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32开 印张：10.75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， 字数：261,000 册数：15,700

统一书号：11011·108 定价：1.00元

目 录

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	1
中国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辟	37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	71
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和发展， 红军的建军原则及古田会议	115
反对李立三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斗争	153
三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	175
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	207
反对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斗争	243
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 斗争	269
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抗日运动的高涨	291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	315

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

一、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建立

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民族资产阶级跟随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，上层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，只有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仍然坚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。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买办资产阶级扶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，代替北洋军阀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的军事专制统治。但是，国民党各派矛盾重重，他们经过激烈的争夺和混战，才在蒋介石的旗号下，取得了表面的和暂时的“统一”。

当时，国民党各派，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派，汪精卫、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，张继、许崇智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（即沪派），以及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西北军，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军阀，还有在南方的粤系、桂系军阀，等等，暂时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开始合流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，冯玉祥发表通电，建议宁汉双方举行会议，解决“党内纠纷”。八月三日，汪精卫、谭延闿、孙科、唐生智联名致电冯玉祥，说明武汉国民党政府“清党”反共的经过，表示与南京合作的愿望。八月四日，冯玉祥将武汉来电转达宁方，认为宁汉意见已趋接近，主张从速召开国民党执监大会，解决一切问题。八月八日，蒋介石、胡汉民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

何应钦等联名致电冯玉祥，对汉方反共表示谅解，认为双方纠纷已经消除，军事上赞成继续“北伐”。其目的在于利用国民党中央的“正统”地位，控制国民党大权。八月十三日，蒋介石被迫下野，离南京去奉化，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偕同亲日派张群等东渡日本。

蒋介石下野完全是以退为进的阴谋，看来有以下因素：（1）为了避一下风头。因为蒋介石到南昌时，扣留了国民党部分中委，曾受到撤职处分，与武汉政府形成对立局面。四一二政变以后，由于他包围和封锁武汉，又受到国民党中央的通缉，双方关系更形紧张。这时蒋介石虽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，但要统一国民党尚有困难。同时，桂系李宗仁采取拥汪反蒋的态度，各方反蒋呼声甚高，蒋介石相当孤立，只好以下野来缓和一下空气。这是形势所迫。（2）以暂时下野之举麻痹汪、唐，然后等候时机来吞并他们，以期不战而胜。蒋介石知道，只要其军力不散，仍可东山再起。（3）蒋介石上台虽然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支持，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支持，但日本方面并不热情。所以，蒋介石下台后，乘机东渡，和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勾结。当时他住在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的家里，表示“亲如一家”，并同日本首相田中进行秘密谈判，达成如下交易：田中提出，“在国际许可的范围以及日本利权不作其他牺牲的范围内，对你的事业不惜充分的援助”。蒋介石的回答是：“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的同志，早日完成革命，排除国民的误解，而如果能这样做，满、蒙问题也容易解决，排日运动会绝迹。”^①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。可见蒋的下台名为退却，实际上是以国家领土主权作赌注，

① 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与蒋介石的会谈记录（节录）》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），见《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》下卷第一分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，第一四八——一四九页。

去博得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，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。

蒋介石的下野，进一步促进了宁汉合流。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，武汉代表汪精卫、谭延闿、孙科、唐生智、顾孟余和南京代表李宗仁，在九江商议合作的办法，决定武汉国民政府于九月三日前迁往南京，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。九月十五日，宁、汉、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，决定成立“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”为最高领导机关，推选李宗仁、汪精卫、蒋介石、胡汉民、谭延闿、孙科等三十人为特委会委员，并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，任命胡汉民、汪精卫、谭延闿、蔡元培、李烈钧等四十三人为国民政府委员。同时，发表了《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》和《南京政府成立宣言》，宣告国民党的“统一”。但由于分赃不均，不仅没有解决宁汉纠纷，反而爆发了宁汉战争。

国民党特委会的成立，等于取消了武汉国民党中央，这样就有利于宁沪，而不利干汉方，特别是桂系利用蒋、汪之间的矛盾而控制了特委会的实权。对此，汪精卫的拥护者唐生智认为特委会的成立无异于篡党。九月二十一日，唐生智成立武汉政治分会，统辖鄂湘皖三省与南京对峙。南京下令限期取消，唐不理睬。九月二十九日，武汉政治分会发表通电，指责南京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违反党章，不予承认。但在党的合法机关未恢复职权之前，可以承认由特委会产生的政府为事实上的政府，与其有条件的合作。十月十九日，桂方的程潜军与武汉何键军在皖南发生冲突，宁汉战争（即桂唐战争）爆发。十月二十日，南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下令讨伐唐生智。十月二十一日，唐生智发表通电声称“南京特别委员会者，政客官僚之集合体，而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也”，“违法篡党而可以不讨，则本党为无人”。十月二十四日，南京亦发表通电，指责唐生智“视党部如传舍，以主义为

玩物”，并委任李宗仁、程潜、朱培德为三、四、五路军总指挥，分三路西征。十一月七日，唐军各路败退，放弃武汉。十一月十一日，唐生智通电下野，乘船逃往日本。桂军占领武汉后，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委派白崇禧为总指挥进攻湖南，白军占领长沙后，唐残部即由李、白改编。这次桂唐战争实际上反映了蒋介石下台后，桂、汪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。结果桂系的权力大增，不仅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，也控制了安徽和两湖地盘。

宁汉分裂时，广东军阀李济深开始抱观望态度，但对南京特委会颇为不满。这时在宁沪不能立足的原武汉中央委员陆续到达广东。张发奎也率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回粤，公开打出“拥汪护党”的旗帜，与南京对峙。李济深认为这给自己增加了实力，并采取联汪立场。十月七日在广州发起迎汪回粤大会，李济深、张发奎联名电请汪精卫回粤，“主持党国大计”。张发奎并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，主张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政纠纷。南京特委会下令广州政治分会限期取消，广州方面拒不接受。十月二十九日，汪精卫回粤，公开表示由特委会产生的南京政府是非法的，拟在广州另组“中央”。三十日，汪精卫召集在粤的执监委开会，会后，汪精卫、李济深、李福林、陈树人、陈公博、甘乃光等联名通电，提议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，产生“合法政府”。十一月初，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，通过三项决议：一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常务委员应从速在广州执行职务，作为国民党最高机关；二、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；三、由常委会召开四中全会，解决一切争端。汪、李在广州公开树起国民党中央的旗号。这样，宁汉对立又变成了宁粤对立。

正当宁粤对立之际，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由日返沪。他认为桂系势力的发展对己不利，就策划联汪反桂，共同反对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把持的特委会。宁方为了应付不利局面，作了某些让步，同意召开四中全会，特委会停止活动，但坚持会议

地点必须在南京。十一月十六日，李宗仁、汪精卫、李济深前往上海，参加四中全会的预备会，同蒋介石商谈取消特委会和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问题。

当汪、李赴沪途中，广州的张发奎、黄琪翔根据汪精卫的事先策划，举行了兵变。十一月十六日深夜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会同李福林的第五军及薛岳的新编第二师，包围了桂系黄绍竑的住宅，黄绍竑潜逃香港，省城桂军全被缴械。十一月十九日，广东政治分会任张发奎为临时军委会主席，陈公博代理广东国民政府主席，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。于是，桂系又与蒋介石联合共同反对汪派。

十二月三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，粤变问题引起汪桂两派的激烈斗争。双方争先讨好蒋介石，汪精卫在会上首先提议，请蒋复职，李宗仁也急忙向报界声明其拥蒋立场。同时，北方的冯玉祥、阎锡山想在与张作霖作战中扩大自己的地盘，也都打来电报，催蒋复职，以便协力攻打张作霖。十二月十日，南京政府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。

十二月十一日，我党乘张发奎、黄琪翔与桂系混战之机，举行广州起义，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。桂系与反汪派借此攻击汪精卫。十三日，蒋介石致电张发奎“带罪立功”，与李济深、陈铭枢等协力反共。并电李福林、黄绍竑、陈铭枢、陈济棠、钱大钧、范石生、方鼎英等协同镇压起义。汪精卫亦发表反共声明。但反汪派并不因此罢休。十二月十四日，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、黄琪翔等职务，十六日又下令查办汪精卫，及汪派中委顾孟余、陈公博、甘乃光、王法勤、王乐平、潘云超、陈树人等。十二月十七日，汪精卫被迫秘密离开上海，由黄琪翔偕同赴欧。至此，粤桂战争以汪精卫和桂系均告失败，蒋介石坐收渔利而结束。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利用了汪、桂的矛盾，排斥了李宗仁，驱逐了汪精卫，重新掌握了南京中央大权，还占领了广东地盘。

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，蒋介石回到南京“主持大计”，一月九日通电宣告复职。二月二日，在蒋介石操纵下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幕。会议改组了国民党中央、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，决定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，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。从此，蒋介石又一手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大权。四中全会后，蒋、桂、冯、阎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“北伐”，暂时获得妥协。二月十五日，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，二月十六日又赴开封和冯玉祥、阎锡山商谈，决定统编他们的军队为四个集团军：蒋的嫡系为第一集团军，由蒋介石兼总司令；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，冯玉祥任总司令；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，阎锡山任总司令；两湖各军为第四集团军，李宗仁任总司令，准备共同“北伐”。

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，蒋介石命令四个集团军合力向奉系发动进攻。四月三十日，蒋介石率领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。五月三日，日军出兵侵占济南，把蒋军贺耀组部一团缴械，将李延年部一团歼灭，蒋介石只穿着衬衣逃出济南。当时日军屠杀中国人民一万余人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五三惨案”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怒潮。蒋介石表示“只有忍辱负重，忍耐下去”。并训令部下“为救一日人，虽杀十人亦可”。蒋军于是绕道北上。接着，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、保定、石家庄、大同、张家口等地，进入北京郊区。张作霖见大势已去，六月二日发表出关通电，六月三日退出北京回沈阳。四日，火车到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站时，张被日军特务炸死。六月八日，阎锡山部进入北京，反奉战争至此结束。十五日，南京政府宣布“统一告成”。

张作霖死后，南京政府对东北军采取“和平解决”的方针。八月九日，蒋介石派方本仁为代表去沈阳，劝张学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。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东北，劝张学良在东北独立。八月八日，日本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前往东北，向张学

良转达田中内阁的意见：“日本政府劝告东北不要换旗，完全出于善意，如果张不能领会，日本将被迫采取积极行动”，逼迫张学良“独立”。美国为了排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，支持蒋介石“统一”，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亲自出马到沈阳，和张学良的代表杨宇霆谈判，劝说张学良归顺南京。经过复杂的斗争，张学良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“易帜”通电。至此，国民党政权取得了表面上的暂时的“统一”。但是，正如毛泽东所说：“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，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，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”^①。又说：“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，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，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。北京天津打下以后，这个团结立即解散，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”。^②

二、国民党新军阀的形成及其政权性质

（一）新军阀的形成及其特点

北洋军阀倒台后形成的新军阀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：一部分是在反北洋军阀的大革命中，窃取革命兵权起家的；另一部分是由北洋军阀蜕变而来。其共同点是和旧军阀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历史渊源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新军阀派系很多，其中最大的是蒋冯阎桂四大系，还有其他许多地方军阀。

蒋系：即蒋介石的嫡系。一九二七年底约有五个军，主要将领有何应钦、陈诚、顾祝同、刘峙、钱大钧等。由于蒋介石趁“北伐”之机收编了旧军阀的大量部队，所以在编制上隶属蒋军

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第四七——四八页。

② 同上，第四七页。

的部队就有五十个军和十九个独立师。到一九二八年二月统编为第一集团军。

冯系：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，冯玉祥在滦州任清军第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三营营长，^① 举兵响应。一九一四年任袁世凯的十四旅旅长。一九一六年直皖战后，改编为直系第十一师。八月，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。这时冯军只有一个师二个旅，但它是西北军的骨干。一九二〇年，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。一九二二年升任陆军检阅使。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，冯军辖一个师三个旅。十月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后，组织国民军，冯为总司令，辖三个军。国民军很快扩展到三十万人左右。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，国民军在直奉两派联合进攻下，在南口等地遭到失败，损失大半，退往西北。五月冯玉祥赴苏考察，途中加入国民党。八月十七日，冯玉祥由苏回国，九月，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，当时不过几万人。冯军出师河南后，到一九二七年底，又迅速发展至十五个军三十多个师。一九二八年统编为第二集团军。

阎系：以阎锡山为首领的军队。阎锡山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，清末任山西一协二标标统，从此盘踞山西，拥兵自重。辛亥革命后，山西宣布独立，阎锡山任山西都督。一九一二年，阎只有一个师一个旅，依附北洋军阀，善保实力。袁世凯死后，他独揽山西军政大权。一九二五年，阎军由原来五个混成旅扩编为十二个混成旅，人数达九万。一九二七年阎锡山投北伐之机，在吴佩孚失败后，他组织“北方革命军”，自任总司令，标榜革命，乘机扩军到二十万人。一九二八年统编为第三集团军。

桂系：以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为核心，而以李宗仁为首

① 一九〇三年袁世凯仿照外国陆军改革北洋军制，其建制是：军、镇、协、标、营、队、排、棚，每棚十四人，相当于后来的军、师、旅、团、营、连、排、班。

领。李、白、黄都出身于广西陆军学堂（黄、白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），都是北洋军阀时期老桂系陆荣廷的部下。一九一八年，李宗仁在老桂系当营长。一九二一年粤桂战争中，李升为统领。陆荣廷战败后，李投靠陈炯明，为“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军”司令，辖部约两千人。一九二二年，陈炯明与孙中山矛盾尖锐化，无暇顾及广西，桂军纷纷独立，李宗仁部改为广西自治军第二军，与黄绍竑部联合，共约三千人。一九二二年，陆荣廷回广西任善后督办，委李宗仁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旅长，下辖三团，黄绍竑是个团长。一九二三年二月，孙中山自沪回粤，李、黄投靠孙中山，进攻梧州。一九二三年秋，李宗仁与黄绍竑、白崇禧夹击老桂系陆云高，占领西江上游，军队发展到一万余人，遂与老桂系陆荣廷、沈鸿英形成鼎足之势。一九二四年五月，李、白、黄进攻南宁，驱逐老桂系陆荣廷出广西，随后又打垮沈鸿英，统一了广西，形成新桂系。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，孙中山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兼第一军军长，黄绍竑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，白崇禧为参谋长。一九二六年初桂系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，李任军长，黄任党代表，白任参谋长，下辖九个旅共二十个团，四万余人。北伐后桂军实力有了发展。一九二七年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，李宗仁跟随蒋介石任第三路军总指挥。徐州会议时，直辖十三个军。一九二八年统编为第四集团军。

此外，地方军阀中势力较大的有：

四川军阀：刘湘、刘文辉、刘存厚、杨森、邓锡侯、田颂尧、赖心辉七大派，共约三十万人。他们各据一方，不断混战。在直系军阀掌握北京政权时，以及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后，吴佩孚退到湖北、湖南时，四川军阀均先后投靠吴佩孚。一九二六年，北伐军打到武汉，吴佩孚节节败退，他们又纷纷投靠国民革命军，各编为一个军。

广东军阀：广东原先是陈炯明、林虎、李福林等人的地盘，国民革命军东征、南征以后，这些人都被赶跑了。一九二七年以后，李济深、张发奎、陈铭枢等占据广东，与汪精卫、胡汉民结合，组成粤系，成为南京的反对派。

奉系军阀：以张作霖为首，张作霖死后，其子张学良继之。一九二八年张学良投向蒋介石，也从旧军阀变成了新军阀，称为东北军。

以上情况说明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与老军阀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买办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工具，他们都推行反革命的军事专政。但是，新军阀也有其不同的特点：

（1）新军阀的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曾不同程度地参加过革命，与旧军阀打过仗，有过某些革命的影响。因此，在一定时间内，可以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欺骗的政治资本。

（2）新军阀都打着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旗号，实则陈酒新装，与旧军阀没有什么区别。由于国民党曾经是革命的政党，新军阀就利用它作为招牌，推行反革命的罪恶勾当。而旧军阀是没有这种政党的旗号和组织形式的。

（3）新军阀绝大部分是由老军阀培植起来的，前者往往是后者的门生和下属，甚至是父子关系。彼此之间具有继承关系，如新桂系之与老桂系，东北军之与奉系，等等。新军阀的发迹大都可以追溯到清末，有的是清末陆军的旧部，如冯、阎等。所以新旧军阀具有一脉相承的封建专制习性。

（4）北洋军阀时代，直、奉、皖三大系交替执政，控制实权。从一九一二到一九二八年，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七年中，内阁更换达四十七次，反映了日、英、美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央统治权的激烈斗争。而新军阀则以蒋介石为首，始终控制了中央大权，并以美国侵略势力占优势，中央权力基本没有更迭。正是由于美

国的支持，蒋介石才能以中央名义和雄厚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力量，把各派军阀一一打垮。

但是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既然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，那么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，也必然伴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而不断发生。蒋介石政权建立和“统一”的过程，也就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过程。在此期间，新军阀的混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。这一期间新军阀蒋介石、汪精卫、李宗仁三派的混战，实质上是为了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。结局是汪精卫、李宗仁斗不过蒋介石，不但使已经下野的蒋介石重新登台，还使他乘机操纵国民党的四中全会，改组了国民党的政府和中央党部，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。以后又当上了“国民政府”主席，把党政军大权齐集于一身。到了一九二八年底，蒋、冯、阎、桂四派新军阀夺取天津、北平以后，在美帝国主义的斡旋下，张学良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，实现了“东北易帜”。至此，新军阀最后战胜了旧军阀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暂时得到了“统一”。

第二阶段：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到一九三〇年三月。蒋介石国民党表面上的统一不久即又陷入了新的分赃斗争。当初大家都想通过政治斗争来达到各自扩大地盘和保存实力的目的，所以在不动干戈之前，还有一番唇枪舌剑的折冲过程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阎锡山占领北平后，蒋、冯、阎、桂在北平集会，商讨裁兵编遣问题。蒋介石为了独揽兵权，拉拢冯、阎到中央政府做官。冯、阎等明知蒋之阴谋，但表面上也只好表示拥护。一九二九一月，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，表面上是为裁减全国兵额，实际上却是企图削弱别人，壮大自己。这无异是挖掉各派军阀的命根子，因此所谓裁兵问题就成为爆发新军阀

混战的主要原因。
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不仅要统一军权，还要统一政权，迫使其他军阀失去立足之地。当蒋联合各派军阀对奉系作战时，为了稳定自己阵脚，曾经实行过地方分权，委任了几个政治分会主席。但反奉战争结束以后，蒋介石就独揽中央大权，在编遣裁兵的同时，他要求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，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，唆使其党羽提出取消政治分会的议案，议决年底取消。经各派反对，蒋介石又在中常会提出延期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前取消。这个问题也成为各派军阀反蒋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，蒋介石为了统一党权，又一手包办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大多数地区的代表都由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圈定或亲自指定。这次大会冯、阎拒不参加，各地纷起反对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，桂系的汉口市党部通电反对，河南省党部提出抗议。但蒋介石置若罔闻。通过三全大会，蒋介石改组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，他的党羽陈果夫、陈立夫等人全部控制了国民党的中央，成了所谓“蒋家天下，陈家党”。

蒋介石吞并异己的所作所为，引起了各派军阀的强烈不满。于是三月以后，就爆发了各派军阀的反蒋战争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，因取消政治分会问题爆发了蒋桂战争，他们主要是为了争夺两湖的地盘。武汉政治分会是李宗仁的大本营，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，实际上无论财政、军事都自成系统，不听南京约束。一九二九年二月，武汉政治分会撤免了亲蒋的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，改组湖南省政府，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。蒋介石以中央名义，下令查办，并调军西进，战争由此开端。四月初，桂系失败，蒋军控制了两湖大部分地区。五月以后，蒋介石又由湖南、广东两省追击桂系。六月底，陈济棠的粤军进占广西，李宗仁、白崇禧被迫暂逃国外。

蒋桂战争之后，紧接着又爆发了蒋冯战争。蒋桂战争时蒋介石采取“稳冯打李”的方针，以免冯、桂联合对他进行南北夹击。蒋介石一方面以地盘和职位来拉拢冯玉祥，另一方面又以重金收买冯的部下，挖冯的墙脚。待桂系解决后，五月底蒋即下令讨冯，由于冯部有被蒋收买的，冯被迫通电下野。七月，第二次编遣会议后，各派军阀对蒋更加不满。十月十日，西北军将领宋哲元、刘郁芬、孙良诚等二十七人通电反蒋，推冯为国民军总司令，分三路出兵东进。蒋介石调大军应战。他恐冯、阎联合，采取“拉阎打冯”的方针，委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，每月向阎拨款六百八十万元。至十一月初，西北军战争失利，退回陕西，战事暂时停止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，郑州的唐生智和安徽的石友三与改组派取得联系，举兵拥汪反蒋。蒋介石调军北上攻唐。这时阎锡山、韩复榘已为蒋收买，加入攻唐。一九三〇年一月，唐生智败退，石友三重新投蒋，战事遂告结束。

这一阶段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，因各派不能真正联合对蒋作战，被蒋各个击破。但这些杂牌军也各有千秋，蒋介石只能取胜一时，而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。一旦他们恢复元气，就又卷土重来，继续同蒋作对。

第三阶段：一九三〇年四月的“中原大战”及地方军阀之间的混战。

这一阶段的新军阀战争带有决战的性质。从政治上看，一方是各派军阀形成反蒋大联合，另一方是美、英帝国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极力支持；从军事上看，全国主要新军阀几乎都参加了这次战争，双方倾注全力，旗鼓相当，动员军队共达一百万以上（蒋军五十万，反蒋军六十万），是中国近代军阀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恶战。

由于蒋介石吞并异己不择手段，各派军阀都不愿投靠他，而